

农民工

周刊

责任编辑:程莉莉
新闻热线:(010)84151095
E-mail:grbnmgzk@163.com

流动性大,管理复杂,接受培训情况存在差异

农民工职业病防治意识有待提升

业内人士建议,多部门联动,多种形式宣传,并建立农民工职业健康数据库

本报记者 唐姝

“职业病?不太清楚,我身体没啥毛病。北京这边(工地环境)比老家好,伙食也好。”正在工地食堂打饭的周易恒(化名)今年50岁,是一名架子工,最近刚从老家甘肃来到北京通州区一建设工地打工,当被问及是否了解职业病防护知识时,他表示了解甚少。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像周师傅这样的农民工2018年全国有28836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由于就业困难、缺乏一技之长,农民工往往从事建筑业、采掘业、加工制造业等职业危害因素高的行业。

4月25日至5月1日是全国第17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记者走访北京市一些建筑工地发现,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健康意识存在较大差异。

农民工成职业病防治重点对象

原卫生部2008年发布的《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规范》显示,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几乎涵盖所有类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粉尘、噪声、放射性物质、有毒有害物质等危害,以及高处作业、密闭空间作业、高温作业、低温作业、高原(低气压)作业、水下(高压)作业等产生的危害。职业病防治工作关系到广大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农民工尤其应成为被保护的重点对象。

不过,记者发现农民工群体对职业病的了解以及防护意识存在差异。在通州区副中心建设工地上,来自河北保定的木工岳允光(化名)今年42岁,他表示自己接受过职业健康宣传教育,“以前挣钱不容易,辛苦一天只挣几十元,所以大家不舍得把钱花在看病上。现在生活水平和工资都提高了,很多工友越来越重视健康问题,意识也在逐渐提高。”

而另一名在附近工地工作的电工张大明(化名)却向记者表示,自己对职业病相关情况不是很了解,很少有防护和防护措施,也没有人专门强调和监管。

在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一施工项目附近,

一名专门给建筑工人理发的师傅杜亮(化名)40多年来一直与工人打交道。他告诉记者,很多工人没有职业病防护意识,一些工人甚至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即使患上职业病也无法获得赔偿。

对企业加强管理需三落实

国家卫健委2018年6月发布的《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国共报告各类职业病新病例26756例,新发职业病人数、累计职业病人数和因职业病死亡人数均居于世界高水平。

近年来,北京市疏解整治散乱污等企业,一大批制造业行业搬迁,一些传统职业病危害企业在减少。不过,生物因素、放射性因素等职业病危害因素依然存在。

职业病防治的关键在企业。新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于2018年12月29日开始施行,为促进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破解职业病鉴定、医治、赔偿难等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记者在走访北京住总集团通州副中心项目部工地时发现,施工现场配备楼体防护罩、除尘器、地面硬化处理等安全防护措施,工地生活区设立农民工夜校,安全宣讲台、宣传栏警示标示等,工人进入施工现场前要接受安全、职业卫生、消防等教育。

该集团行保部部长董鹏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大型企业会按照国家要求的标准配备安全防护措施,建筑材料努力向无毒无害化推进,比如使用卷材代替沥青防水等。但他同时坦言,建设标准化设施需要投入资金,成本至少高出两三倍。而一些不太规范的建筑承包商或者小型施工队,可能为了追求利润,降低成本而不使用环保材料,在防护措施上会有所节省,同时对职业健康缺乏重视以及相关宣传和培训。

对于企业应承担的责任,董鹏表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职业健康的组织体系,从领导到二级单位,包括基层的项目部,需设专人管理,主抓职业健康;二是资金的投入,包括防护设施、人员的培训教育、体检等方面的投入;三是健全培训和宣传机制,同时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提升工人自我防护意识。”

北京市卫健委职业健康处处长李玉祥认为,应加强企业自身管理,做到管理工作三落实:一是落实组织机构,企业要设立专门的职业卫生管理机

构;二是落实人员,管理机构内要有专职或兼职的管理人员,负责职业病防治工作计划落实;三是落实管理制度,建立职业卫生责任体系,有效推动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开展。李玉祥表示,“企业对法人代表和有关人员,以及职工的职业卫生相关培训是尤为重要的,其次要加强职业病危害告知,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同时要定期检测,定期体检,佩戴防护用品是最后一道防线。”

提升工人自我防护意识遇难题

除了企业应承担的责任以外,如何提高工人自身的防护意识也十分重要。而相关部门及企业开展的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对工人意识的提升起到多大的效果还有待考量。

一名水电管道施工安全管理员贾强(化名)告诉记者,公司每年4月都有职业健康宣传活动,各分公司派代表学习后再一级级向下传达到一线工人,这种方式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向下传达的过程中,最终的效果可能会打了折扣。有些工人嫌麻烦或者不方便就不戴安全帽和防尘口罩的情况时有发生。

对此,北京市卫健委职业健康处调研员吴强表示:“很多企业配备的防护用品都不完善,但是从以往检查的情况来看,有些时候工人自己并不重视。”

那么,为何提高工人的防护意识会面临困难? 游城街道专职安全员张建华已从事四五年的职业健康安全宣讲工作,他认为,农民工流动性强,尤其是在建筑行业,工作单位时有变动,由此带来人员管理难、职业健康监管复杂的问题。

董鹏也表示,职业健康培训教育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和持续性,工人的意识也需逐渐提升。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如何保证人员长期接受培训教育是个很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政府部门或者一些社会组织介入,比如让从业者使用手机软件接受职业健康教育和培训,通过每天学习或答题来不断提升自身意识。”董鹏又补充道,“不过每个企业对此重视程度不一样,当工人换到其他工地时可能缺乏相关宣传和培训,这就使其慢慢忽视职业健康。”

此外,工人流动性强,导致职业健康检查及建立职业卫生档案面临困难。而且有些职业病发病具有滞后性,像尘肺病潜伏期有时可长达几十年。

董鹏说,“我们的工程两年就结束了,所以体检的作用可能不太明显。另外,由于工程层层转包下去,工人与分包企业签订合同,因此体检职责由分包企业来负责更合理。”

另外,很多工人不敢进行体检,害怕因为暴露健康问题而无法找到工作,甚至怕在岗位期间得病被辞退,因而可能会向用人单位隐瞒实际情况。

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需建立长效机制

在去年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职业安全健康监管职责由原来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转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业健康司承担,此次机构改革利于推进职业卫生监管事权统一,可见国家对职业病防治给予高度重视。

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职业健康处了解到,农民工职业健康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劳动用工制度不健全,农民工缺乏有效劳动合同的保护;执法不到位及监管不力;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意识淡薄;职业病防治技术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农民工对相关职业法律法规了解不够,不了解自身职业健康监护权益等。

李玉祥表示,2019年将继续压实属地政府和企业的两个责任,对建设项目实现闭环管理,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继续加强对小微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指导和帮扶工作,进一步整合各级职业病防治院所、疾控中心 and 医疗卫生机构的资源和力量,明确各级机构的职责、功能和建设目标,同时强化宣传和培训工作,营造全社会关注职业卫生的氛围。

在北京市职业病防治和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防控联合会副秘书长胡兰看来,职业病防治涉及很多部门,且需要对企业不同层级的部门做好宣传,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培训,“无论什么情况,劳动者培训必须抓好,这是安全和健康的前提。”

董鹏则表示,如果每个项目都体检,也会导致成本和时间的浪费。“政府部门有必要建立一个农民工职业健康数据库。如果企业有了可供查询的平台,就会清楚地知道该员工的体检情况、培训记录、从业年限等。这也会倒逼分包企业重视职业健康,建立职业健康信用等级。施工总承包单位也可以像查询安全记录一样查询分包企业的职业健康记录。”

相关机构将开展中药治疗尘肺病的临床研究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4月23日,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与广东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会上,该公司捐赠30万元现金和价值100万元的药材,专门用于化橘红对于尘肺病的临床治疗研究。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表示,接下来将组织有关定点医院开展临床研究,并将科研成果抓紧推广,造福广大尘肺病患者。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报告各类职业病新病例26756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22701例。

“众多尘肺病患者无论是治疗还是生活保障,都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已陆续出现了30多个尘肺病村,他们渴望自由呼吸,也渴望社会对他们的关爱。这些年,基金会一直在寻找能够有效预防治疗尘肺病的方法,所以才有了这次合作。”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理事长黄毅说。基金会成立16年来,依靠60余家定点医院、21个办事处(联络办)及众多的志愿者队伍,先后投入了2亿多元善款,救助了25万名尘肺病患者。

据介绍,化橘红是一种中药材,也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3年,北京中医药大学罗华强教授牵头对橘红牌化橘红抗肺纤维化的研究结果显示,柚皮苷对特异性肺纤维化具有一定抑制作用。

湖北两家企业为员工撑起预防职业病的「安全伞」

本报记者 邹明强
本报通讯员 何俊
张复生 陈琰莉

4月25日至5月1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医保局、省总工会联合开展了以“健康中国,职业健康同行”为主题的2019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活动聚焦尘肺病防治攻坚重点工作,以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责任、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以及职业病诊断鉴定、职业病病人保障、工伤保险、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生活救助法规政策等为主要内容,组织有关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讲活动,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病防治工作。湖北职业病防治效果怎么样?记者日前来到武汉石化公司、武钢程潮矿业有限公司,发现相关制度和措施的落实,为职工撑起了职业病的“安全伞”。

武汉石化公司职工一年一度体检工作日前结束。结果表明,武汉石化连续八年未发生一起职业病案例。

武汉石化是一家石油炼制企业,属于易燃易爆、高温高压的高危行业,部分生产介质有毒有害,部分岗位有噪声、高温、辐射等危害,现有在岗职工2000余人。

为了防止职业病的发生,企业根据作业环境和国家标准为职工配备合格充足的劳动防护用品。除了为每位职工配备防静电工作服、防砸工鞋及安全帽等基本劳动防护用品外,还为特殊岗位职工配备耳塞、护目镜、口罩、面罩、便携式报警仪等个体防护用品。过去,职工巡检发现易燃易爆气体靠鼻子闻。近几年,企业广泛配备了便携式报警仪,现场有异味自动检测、报警。2018年,武汉石化又斥资近百万元,购置8套远程预警互联报警仪,方便职工发现异常的同时,防止发生急性中毒事故,进一步保护职工身体健康。

武钢程潮矿业有限公司职业病防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作方针,为年度职业病防治工作确定工作重点,理清思路。年初,公司制定下发了2018年职业病防治工作计划和方案,明确了2018年度职业病防治目标及16项具体工作计划方案,并将职业病防治计划和方案下发各基层单位。

公司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标准要求,统一修订完善了职业健康管理档案及892名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每年及时更新完善。

公司重点围绕职业卫生管理责任体系、规章制度、管理机构、前期预防、工作场所管理、防护设施、个人防护、教育培训、健康监护、应急管理等方面开展专项整治活动。邀请在本单位做定期检测的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专业人员参加,从用人单位基本信息调查入手,结合本单位生产的主要原材料、主要辅助材料的年消耗量和产品的年产量、生产工艺等情况,在每年定期检测报告的基础上,开展本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等情况调查,通过专项治理活动的开展,进一步规范了10余项职业病防治管理难题。

2018年3月13日~16日,公司举办2期工区长以上管理人员职业健康管理知识培训班,共计249人参加了培训,为更真实检验参训人员对培训内容的掌握情况,公司采取电脑机考的形式,对参训人员进行理论知识考试。通过培训,各级管理人员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防治重难点及防治工作方法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对职业病防治工作在基层落地生根起到扎实的指导作用。

同时,公司投入200余万元,对井下开采延伸增加通风、除尘测点设施、除尘器及氧气自救器更换、井下通风系统检测及反风试验、购买通风器材等职业健康防护设备设施进行了更新、改造,更换作业现场设置职业危害因素和处置措施、职业危害事故应急处置方案公示牌15块,更新作业现场粉尘、噪声等职业病危害告知牌111块,职业卫生防护设施配备及效果得到持续改善。

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市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法律法规及管理标准,陆续投入近100万元,组织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的机构,对两个新、改、扩建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及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对新、改、扩建项目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有力技术支持和保障。



“鲜花经济”富农户

5月7日,定州市杨家庄乡八里店村农民在花产业基地工作。近年来,河北省定州市结合市场需求,引导农民大力发展高效花卉产业,并推行“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目前,当地花卉产品不仅销售到周边县市,还打入北京、天津等地花卉市场,在扮靓城市的同时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发改委:到2022年初步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解决农民工落户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

本报讯(记者李逸萌)5月6日,国家发改委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意见》指出,到2022年,初步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陈亚军在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018年底,中国仍有2.26亿已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户城市的农业转移

人口,其中65%分布在地级以上城市。因此,解决好落户问题需要大中城市和小城镇联动,推动大中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他同时提醒,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要把握好政策内涵,避免引起对政策的误解或曲解。

首先,不能搞选择性的改革。解决农民工落户问题要坚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已经在城

市长期就业、工作、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特别是举家迁徙的人群、新生代农民工人群以及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人群是落户重点,“而不是说片面地去抢人才”。

其次,放宽落户不等于放松房地产调控。陈亚军强调,不管户籍制度怎么改,“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定位必须坚持,不能动摇。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董君亚

斑驳的土墙,原生态的泥土地,没有一件像样的桌椅,一张久经岁月侵蚀的木桌,手写的诗词贴在墙上——这是位于河南周口市太康县杨庙乡陈庄村的图书馆原来的模样。“馆长”是一对未成年的小妹妹,藏书不过100来册,但却是全村留守儿童们最爱光顾的地方,馆内的图书都是她们一本一本在废品中捡回来的“珍宝”。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由当地媒体大报捐建的“大河圆梦书屋”在小妹妹家中正式挂牌。目前,中建二局已对小妹妹家的图书馆完成装修升级,如今的图书馆看起来更加明亮整洁,阅读环境大为改善。

连日来,作为农民工子弟,这对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妹妹,因为渴望多读书、读好书“捡”出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而受到社会关注。

12岁的姐姐叫吴楠楠,10岁的妹妹叫吴适可,今年一个上初一,一个读小学三年级。因为她们身体不好,需要人照料,姐妹俩打小就跟随母亲生活在姥姥家,姥姥常年需要看病吃药,再加上没有其

他经济来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是拮据,为补贴家用,姥姥经常带着姐妹俩外出捡垃圾。

“这些书最开始都是她们一起捡垃圾的时候捡回来的,一本本擦干净、收藏好。”姐妹俩的舅舅陈纯新介绍说,因为自己热爱文学,喜欢去旧书摊买书,所以可能对两个孩子有影响。因此,姐妹俩在四五岁时偶尔跟外婆出去捡废品,每次看到书都会捡回家,慢慢书就多了起来,而小伙伴中也有人常常跟她们借书。

看到这种情况,姐妹俩和家人商量后,从家中几间破旧的房中,收拾出一间专门放置这些图书,供村里的孩子看,图书馆就这样成立了。每逢节假日和星期天,孩子们都会自发聚集到这里读书。

由于妹妹吴适可有严重眼疾,姐姐吴楠楠就承担起图书馆的“管理”工作,每当有人看完图书,她就会及时接过图书,归类并摆放整齐,俨然一副馆

“村里没有图书馆,我们捡一个!”

——小妹妹废品堆里的“创馆之路”

长模样。在这对留守姐妹的故事被河南当地媒体报道后,几乎每日都有全省各地的图书寄过来,加上吴楠楠原本收藏的图书,已经有近万本。

“他们给我捐的这些书有很多都是我之前想看却看没有的,非常感谢他们。”吴楠楠说,“现在有了这么多的书,我会和妹妹一起做图书管理员,把来借书的小朋友的名字登记好,让他们可以在这里看,也可以带回家看,还要提醒他们要保护好那些书,让这个小小图书馆在村里发挥作用。”

太康县教体局、妇联以及杨庙中心校分别给小妹妹俩送去了共计1000多本图书和崭新的桌椅板凳。万城乡商太康县企业家公益团负责人陈家济也及时组织公益团成员,给小妹妹捐了4000元善款,准备用于治疗吴适可的眼疾。

事实上,小妹妹办“图书馆”的故事,也折射出中西

部地区乡村留守儿童图书阅读率不足的现实问题。

据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阅读量城乡差异非常明显,农村未成年人的阅读率低于城镇未成年人10.3个百分点,这既有农村家庭阅读氛围不强、阅读习惯欠缺的原因,也有农村阅读资源不足的原因。

也有调研显示,在贵州、四川、河南等地的一些乡村学校,超过71%的受访者表示家庭藏书低于10本,接近20%的孩子家里一本藏书都没有。与此同时,不少地方的乡村少年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由于面临父母缺席、隔代教育、缺少玩伴和寄宿制度等各种客观情况,往往很容易陷入“手机病”“网游瘾”的泥潭。

有专家指出,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应该加大对乡村阅读资源的投入,打造以农村校园图书馆为代表的乡村阅读平台,逐步改变农村少年儿童缺少图书、阅读量偏低的情况。